

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

罗 鹭

内容提要： 作为一名蒙古族诗人、学者，法式善对元诗有天然的亲近感。他在《四库全书》馆任职期间，购买和抄录大量元人诗集，并积极参与元诗文献的整理、传播与研究。清人批评元诗，或者以唐音来观照元诗，或者将元诗与宋诗并举，但受王士禛、翁方纲和袁枚的影响，法式善具有较为融通的诗学思想，能够平等对待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诗。法式善在批评实践中将元诗和清诗进行比较，充分肯定元诗自身的风格与特质，与《四库提要》代表的官方诗学话语，其批评方法有相通之处，但立场并不一致。法式善在元诗接受史和清代诗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关键词： 法式善 元诗接受 《四库提要》 乾嘉诗学

法式善(1753-1813)原名运昌，字开文，号时帆，又号梧门、诗龛等。法式善是蒙古族人，乌尔吉氏，隶属内务府正黄旗。法式善于乾隆四十五年(1780)中进士，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、国子祭酒等。乾隆五十年(1785)，乾隆皇帝以其名与关帝号音相近，诏改为“法式善”，在满语中是“奋勉”之意。从法式善留存下来的藏书、著述来看，他确实是一位“奋勉”的学者。近年来，法式善诗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^①，主要围绕法式善《梧门诗话》《八旗诗话》等诗学著作展开，探讨法式善的诗学活动、诗学思想及其与乾嘉诗坛的关系。然而，作为蒙古族学者，法式善对元诗有天然的亲近感，他对元诗的抄录、收藏、阅读与批评，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^① 近十年有关法式善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，强迪艺：《法式善〈梧门诗话〉研究》，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4年；宏伟：《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》，沈阳：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06年；米彦青：《从〈梧门诗话〉看法式善的唐诗观》，《内蒙古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0年第2期；黄建光：《〈梧门诗话〉诗学思想研究》，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0年；刘青山：《法式善研究》，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1年；吴玲娜：《法式善〈八旗诗话〉研究》，内蒙古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1年；王娟娟：《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》，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2年；李淑岩：《法式善诗学活动研究》，哈尔滨：黑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；蒋寅：《法式善：乾嘉之际诗学转型的典型个案》，《江汉论坛》2013年第8期。

清人对元诗文献的整理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,前一阶段以康熙年间顾嗣立编纂《元诗选》为标志性成果;后一阶段以乾隆年间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整理元诗别集、总集为代表。在乾隆四十七年(1782)开列的“办理《四库全书》在事诸臣职名”中,有担任翰林院提调官的“翰林院检讨臣运昌”^①,运昌就是法式善,据张升考证,法式善在《四库全书》馆任职长达十余年^②。由于法式善的蒙古族身份,他在四库馆中对元诗非常关注,不仅抄录元诗文献资料,而且在创作和批评方面予以重视。

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不仅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早已亡佚的典籍五百余种,还从民间征集到不少孤本秘籍。以元人别集为例,与康熙年间顾嗣立编纂《元诗选》搜集到的元人别集相比,《四库全书》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亡佚元人别集 27 种,还从各省采进罕见元人别集 21 种。这 48 种元人别集,对乾嘉年间的学者来说,是很想先睹为快的珍稀秘籍。在《四库全书》的江南三阁本和翰林院副本向读书士子提供抄阅之前,率先利用这批罕见文献的只可能是四库馆臣。法式善在《四库全书》馆期间,利用职务之便抄录了大量珍稀文献,其中包括元人别集二十二家、八十二卷^③。这些元人诗集,与宋人诗集六十家一起,合编为《宋元人诗集八十二种》^④,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这些元人诗集是借《四库全书》底本抄录,与现存《四库全书》本相比,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。例如,程端礼《畏斋集》卷一《题家铉翁诗卷》中的“家”字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误作“宋”字;卷二《赠术士峻峰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脱“术”字。又如,沈梦麟《花溪集》的编排次序与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颇为不同;赵沅《东山存稿》比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多嘉靖三十七年戊午(1558)新安鲍志定序,等等,皆有助于版本考订。根据《陶庐杂录》记载,法式善在北京庙市书摊还购得四库馆辑《永乐大典》稿本宋元人集五十五种、八百二十三卷,其中有元人集二十三种^⑤。上述前后两批所得之书,构成法式善藏书中元人诗集的主体部分。除去《畏斋集》《子渊诗集》重复抄录,《庐山集》《英溪集》在《陶庐杂录》中计入宋人集外,合计元人诗集四十一家,与法式善在《宋元人集钞存序》中所述元人诗集数量

① 永瑢、纪昀等编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卷首”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 年,第 12 页。

② 张升:《法式善与〈四库全书〉》,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《历史文献研究》总第 29 辑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 年,第 278 页。

③ 法式善:《陶庐杂录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59 年,第 68 页。

④ 《陶庐杂录》只著录宋人集五十九家,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实为六十家,多“蔡宗礼《北海集》一卷”,可能是法式善撰写《陶庐杂录》时偶然失检。

⑤ 法式善:《陶庐杂录》,第 62、63 页。

相符^①。除了以上四十一家,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法式善稿本《存素堂书目》和《诗龕藏书目续编》,法式善通过其他渠道收藏的元人别集还有仇远《金渊集》、萨都刺《雁门集》、杨维桢《铁崖古乐府》、王结《文忠集》、姚燧《牧庵集》、虞集《道园遗稿》等近三十种;见于《陶庐杂录》记载的元诗总集还有《元风雅》《乾坤清气集》《草堂雅集》《宋元诗会》《元诗选》《元诗选癸集》等。

法式善不仅努力搜集元人诗集,还热衷于元人诗集的流通与传播。例如,常熟学者、刻书家席世昌、席世臣因整理出版元代文献的需要,曾请法式善代为抄录稀见的元人别集。法式善在为席世昌撰写《〈元史类编〉》书后时说:“十年前,席孝廉世昌自松江寄书至,谋补梓顾侠君《元诗癸集》,并述搜罗元诗极富,乞余购元人别集数种,余皆抄而寄之,固知其于元史足相发明矣。逾年,果有《元史类编》之刻。”^②常熟席氏与长洲顾氏有姻亲,故席世昌、席世臣谋求补刻顾嗣立《元诗选癸集》遗稿。法式善为席世昌抄寄元人别集数种,作为编选元诗的底本,也间接地推动了元诗在乾嘉时期的传播。席世臣于嘉庆三年(1798)刻完《元诗选癸集》后,又利用《四库全书》中的秘籍对顾嗣立《元诗选》进行补遗,但《元诗选补遗》后来被金山钱氏于道光年间据为己有而刊刻问世,成为元诗接受史上的一桩公案^③。法式善作为见证人之一,曾向席世臣借阅《元诗选补遗》,并抄录其目录,也为这一公案提供了宝贵的证据,功不可没。

二

清代的元诗接受进程,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时期诗学思潮的影响。明末清初,诗坛盟主钱谦益、王士禛先后提倡宋诗,以此纠正明代复古派诗学独宗盛唐的弊病,由于元诗在明代中后期受到冷遇,与宋诗是天然的盟友,因此,明末清初的“宋元风尚”成为重要的诗学潮流。受此影响,元诗接受在康熙年间达到高潮,涌现了大量元诗选本,元诗批评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。尽管王士禛晚年重新提倡唐诗,但他对元诗的喜好始终没有改变。雍、乾之际,以厉鹗为代表的宋诗派和沈德潜为代表的宗唐派对峙于诗坛。然而,与清初的诗学风尚不同,这一时期宋诗派的代表诗人对宋诗的特质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,不再像钱谦益、王士禛等人那

① 法式善曾汇编《宋元人集抄存》,计宋人集八十九家、元人集四十一家,总计一百七十七册。(参见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二《宋元人集抄存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685页。)但张升认为,《宋元人集抄存序》中所说宋人集八十九家、元人集四十一家是法式善抄存的宋元人集全本,而今存《宋元人诗集八十二种》只是“汇编本的一部分流传至今”,后又称法式善购藏的《四库》大典本稿本,也大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。(参见张升《法式善与〈四库全书〉》,第280页。)实际上,存素堂抄本与法式善购藏《大典》本合并在一起,去除重复,基本符合宋人集八十九家、元人集四十一家之数,并非另有大量抄本亡佚。

② 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715页。

③ 参见罗鹭《元诗选补遗考辨》,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07年第4期。

样关注元诗,人为地将宋元诗捆绑在一起;而宗唐派诗人认为,唐诗是最高的美学典范,元人虽极力学唐,但终究远逊于唐,因而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关注元诗。以沈德潜为例,他于康熙五十六年(1717)刊刻《唐诗别裁集》、雍正十二年(1734)编成《明诗别裁集》、乾隆二十四年(1759)编刻《清诗别裁集》,唯独不选宋、元诗,这一做法可以看出他对清初诗坛宋、元风尚的反拨。乾嘉之际的诗学思潮,以翁方纲“肌理说”和袁枚“性灵说”影响最大。但从他们对待唐、宋、元诗的态度来看,不能简单地冠以“宗唐”“宗宋”的标签,而是呈现出融通历代的诗学思想。作为乾嘉诗坛相当活跃的诗人 and 批评家,法式善与翁方纲、袁枚都有非常密切的交往^①,因而具有较为融通的诗学观念。

在元诗接受史和清代诗学史上,翁方纲是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。翁方纲与他的父亲都是黄叔琳的弟子,而黄叔琳是王士禛的门人,故翁方纲称得上是王士禛的再传弟子。王士禛在康熙年间对宋元诗的提倡,于清代诗学影响巨大^②。翁方纲的诗学思想深受王士禛影响,表现出对元诗的极大兴趣。他在《石洲诗话》卷五中专论金元诗,共 202 条,其中多次引述王士禛对元诗的批评;他在《四库提要分纂稿》中对“元诗四大家”中的虞集推崇备至;在江西任学政时曾各取黄庭坚(号山谷)和虞集(号道园)名号中的一字命名书斋为“谷园”;又于嘉庆十一年(1806)刊刻《虞文靖公诗集》,编纂《虞文靖公年谱》;他还经常唱和虞集诗,并化用虞集等元代诗人作品为典故。与翁方纲的家学渊源相似,法式善的生父广顺是翁方纲门人,而法式善本人也从游数十年之久,并先后任职于《四库全书》馆。因此,法式善的诗学活动同时受到王士禛和翁方纲的影响。举例来说,王士禛曾唱和元人吴莱《题钱舜举张丽华侍女汲井图》诗,至乾、嘉时期,经翁方纲的再次提倡,考课诸生^③,达到唱和的高峰。考翁方纲有《象星以〈和吴渊颖题钱舜举张丽华侍女汲井图诗〉见示因赋此》^④一诗,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八年(1763),是翁方纲友人中唱和吴莱此诗之始。在此前后,参与唱和的翁方纲子弟、亲友还有翁树培、顾宗泰、叶绍本、陈用光等,而法式善唱和诗作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题为《和吴渊颖题钱舜举张丽华侍女汲井图》:“芙蓉槛外梧桐树,故宫容易秋风度。美人何事汲云浆,绠系银床朝复暮。绮阁曾温苾苾汤,香溪谁盥蔷薇露。璧月琼枝艳一时,丹砂难得红颜驻。船头铁甲鼓声哀,簾角金瓶花影妒。晓梦犹传醉里歌,鬢云一缕紫兰柱。至今枯髀冽寒泉,宫鸦啼罢华

① 有关法式善与翁方纲、袁枚的交游与诗学观异同,参见刘青山《法式善与乾嘉诗人群之互动(上)》,《法式善研究》,第 79-111 页。

② 参见蒋寅《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》,《王渔洋与康熙诗坛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1 年,第 26-54 页。

③ 陈用光在《太乙舟诗集》卷十二《题乔鹭洲宜园读书图》之二自注“往章溪先生尝以渔洋和渊颖《张丽华侍女汲井图》作诗课,君集亦有此题。”参见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93 册,第 230 页。

④ 翁方纲:《复初斋诗集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54 册,第 371 页。

林误。南埭空闻夜雨声,辘轳不转蟾蜍吐。”^①从作品的时间先后来看,法式善是间接受到翁方纲唱和王士禛的影响。

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,无论诗学观念还是诗歌创作,法式善受王士禛的影响更深。法式善诗歌创作的审美趣味,“是非常典型的宗尚神韵说、取法唐代王孟韦柳诗歌风格的创作”^②。他在《王子文秀才诗序》一文中自述诗学趣味:“于我朝诗人中则深嗜渔洋先生。”^③而翁方纲对王士禛的“神韵说”则持保留态度,他编选《七言诗三昧举隅》,摘录王士禛《古诗选》中的七言歌行十四家、二十六首,以己意加以阐释,借王士禛的幌子来努力建构自我^④。从二人对元代诗人的推崇来看,王士禛喜爱吴莱(字渊颖),翁方纲宗尚虞集(号道园)。翁方纲批评王士禛说:“渔洋先生拈取三昧,盖专在王、孟一派,与道园之深诣本不同调。”“夫辞也者,各指其所之,要以朴学为归耳,岂仅于羚羊挂角之悟而已?”又说:“渊颖集,渔洋少时所服膺者。取材极博,而肌理稍粗。”^⑤针对王士禛的“妙悟”“神韵”,翁方纲提出“肌理”“朴学”等加以补救,因而走向了“以学问为诗”的道路。法式善虽与翁方纲有师友之谊,但其诗歌创作所呈现的审美风貌与翁方纲迥然不同。因此,翁方纲眼中的元诗,可能更倾向于宋诗化的元诗;而法式善眼中的元诗,可能更接近元诗的真面目。

作为乾嘉时代的诗坛领袖,法式善与袁枚虽然从未会面,但书信往来却非常密切^⑥。关于二人的诗学渊源,蒋寅认为,法式善的诗学无论在诗歌观念上还是批评方法上,都与袁枚诗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^⑦;魏中林认为,法式善的诗学是以“性情说”为核心的诗学理论思想,既与“性灵说”的主导精神有相通之处,也对其弊病有所修正^⑧。从元诗接受的角度来看,法式善的“性情说”与袁枚的“性灵说”有更多的相通之处。二人也经常将“性灵”和“性情”混用。例如,袁枚在《答曾南村论诗》中说:“提笔先须问性情,风裁休划宋元明。”^⑨法式善在《王子文秀才诗序》中表明要洞悉别人的“性情心术”才肯为人作序,并坚持自己的诗学立场:“好读诗,无论汉魏六朝、唐宋元明,惟取其是者是之,其非者辄置之。”^⑩尤其赞同这样的观点:“诗以道

① 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483、484页。

② 参见米彦青《论唐代“王孟”诗风对法式善诗歌创作的影响》,《南京师大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0年第1期。

③ 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678页。

④ 参见唐芸芸《走出神韵》,《翁方纲诗学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,2011年,第40-43页。

⑤ 翁方纲:《七言诗三昧举隅》,丁福保编《清诗话》上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302、303页。

⑥ 刘青山:《法式善与乾嘉诗人群之互动(上)》,《法式善研究》,第79-84页。

⑦ 蒋寅:《法式善:乾嘉之际诗学转型的典型个案》,《江汉论坛》2013年第8期。

⑧ 魏中林:《法式善的诗学思想及其在乾嘉诗坛上的地位》,《民族文学研究》1993年第3期。

⑨ 袁枚:《小仓山房诗集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,第73页。

⑩ 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,第678页。

性情已耳。苟能出于性情,勿论唐可,宋亦可也;如其不出于性情,勿论唐非,宋亦非也。”^①在以性灵或性情为标准的理论前提下,唐、宋、元、明诗的时代界限就不存在了,只要是出于性情或性灵的诗,都是好诗。这就从理论上为元诗接受开拓了广阔的空间。

在性灵派诗论家中,郭麐(1767-1831)对元诗的关注最多。其《灵芬馆诗话》大量摘录《归田诗话》《辍耕录》等著作中的元诗评论,以己意考订、折衷,持论较为平允。但《灵芬馆诗话》最能看出郭麐性情的是他所摘录的 39 首元人绝句,相当于一部微型元人绝句选。其摘录标准是“疏朗清新、有逸调而无软熟之习者”,并自言“酒阑灯炮,茶熟香温,开卷雒诵,聊以自娱而已”^②,正是这种闲适自娱的情境,真实地反映了选家的个人嗜好。从批评方法来看,法式善也有类似的做法。他在《陶庐杂录》中提到:“朱竹垞谓偶吏目恒所选元诗为独开生面,而以缺七言绝句为憾。余尝欲补之而未就也。因忆文渊阁校《四库》书,所阅元人诗佳者,辄录存,多《四朝诗选》《元文类》《宋元诗会》《元诗体要》《元风雅》《元诗选》《元诗癸集》中所未载者,将来合诸集甄综之,以复吏目旧观,竹垞翁其许我乎?”^③经法式善录存而赞赏的元人七绝 45 首^④,同样是一部微型的元人七绝诗选。比较法式善和郭麐所选元人绝句,其风格颇为雷同,说明二人有相近的诗学渊源。

乾嘉之际的诗学思潮,如果说翁方纲的“肌理说”是重视创作主体的学问修养,袁枚的“性灵说”是重视创作主体的个性抒发,那么,兼有学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法式善,既有渊博的学识,但并不在诗歌创作中卖弄学问;既重视主体的性情,也不随心所欲。同时,由于受到王士禛“神韵说”的影响,法式善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独特的面貌。如此多元的诗学渊源,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法式善元诗接受的广度和深度。

三

乾隆年间编撰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以提要的形式对古代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,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学批评资料,值得深入挖掘。以元诗批评而言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元人别集 205 种,对每种别集都评价其优劣得失,代表了乾嘉时期元诗批评的主流观念和权威话语。《四库提要》对元诗批评的内容之多、影响之大,同时代的批评家无出其右。虽然法式善参与了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但他进入《四库全书》馆时《四库提要》的初稿已经完成。因此,法式善对元诗的批评,主要反映了他自身的诗学趣味和审美观念。

① 法式善:《梧门诗话合校》卷六,张寅彭、强迪艺编校,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5 年,第 196、197 页。

② 郭麐:《灵芬馆诗话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705 册,第 357、358 页。

③ 法式善:《陶庐杂录》,第 27 页。

④ 法式善:《陶庐杂录》,第 27-30 页。

由于文献不足,目前没有发现法式善对元代诗人和作品的直接评论资料。法式善最重要的诗学著作《梧门诗话》,主要着眼于当时诗坛的评论。庆幸的是,法式善在批评清诗的同时,不知不觉地引入元诗与之对照,使我们间接地知道他对元诗的态度。例如,他在诗话中说:“陈古渔毅最喜韩竹邻洒芳诗,如‘晚霞红漏天边月,秋叶黄飘树底云’,是其佳句也;近虞山屈上舍培基有‘晚月带霞红有迹,秋梧过雨绿无痕’之句,与此相似。皆有元人风致。”^①这里的“元人风致”,法式善虽然没有明确解释,但揣摩他所举诗句,应当是指清丽、纤巧的风格。元人萨都刺《兰溪舟中》诗有“水底霞天鱼尾赤,春波绿占白鸥汀”^②之句,后一句的用词与句法,正与“晚霞红漏天边月,秋叶黄飘树底云”相同。萨诗是俯瞰水底,韩诗是仰望天空,虽所见不同,但二者风格一致。这种风格,在明清以来的批评家眼中,既是元诗的特色,也是其弊病。《四库提要》曾引述李东阳《怀麓堂诗话》说:“孟载《春草诗》最传,然‘绿迷歌扇,红衬舞裙’,已不能脱元诗气习;至‘帘为看山尽卷西’,更过纤巧;‘春来帘幕怕朝东’,直艳词耳。”^③将“元人风致”与“元诗气习”两个术语进行比较,虽然二者都是对元诗整体风格的描述,其所指涉的具体含义也可能大同小异,但所反映的诗学态度截然不同。“风致”是一种美好的、值得肯定的风格;而“气习”往往是指陈腐的、需要革除的风格。明初学者方孝孺曾有一首论元诗绝句:“天历诸公制作新,力排旧习祖唐人。粗豪未脱风沙气,难诋熙丰作后尘。”^④方孝孺批评元诗有“粗豪”气习的观点,在明清时期的诗话中被广泛征引。除此之外,元诗“纤巧”“绮丽”的弊病也是明清批评家要努力摒除的“气习”。《四库提要》在评价明初诗歌创作时,总是肯定那些能够摆脱“元诗气习”的作家。例如,该书评价汪广洋《凤池吟稿》说:“今观是集,大都清刚典重,一洗元人纤媚之习。”^⑤评价王翰《梁园寓稿》说:“自抒性情,无元人秣纤之习。”^⑥反之,像杨基那样不能摆脱“元诗习气”的诗人,则只能视为元、明易代之际的过渡人物,无法视为有功于明诗的开创者。由此可见,法式善与《四库提要》的批评策略和批评方法是一致的。《四库提要》借批评明诗来否定“元诗习气”,法式善借批评清诗来肯定“元人风致”。

除了对元诗的整体风格有肯定的评价,法式善对元代重要诗人的个体风格也有精准的把握,他对元人萨都刺《雁门集》的阅读与体悟颇深。法式善的同年进士甘立猷著有《养云楼诗》,他特别欣赏其《暮春闲咏》“燕子来时帘乍卷,梨花落后梦初闲”句,《途次德州》“垂杨不绾离愁住,又过安陵旧板桥”句,以及《游春词》:“韦杜城南十万家,春风到处酒旗斜。典衣争

① 法式善:《梧门诗话合校》,张寅彭、强迪艺编校,第123页。

② 萨都刺:《雁门集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334页。

③ 永瑢、纪昀等编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九《眉庵集》“提要”,第1472页。

④ 方孝孺:《逊志斋集》卷二四《谈诗五首》之四,徐光大学校点,宁波:宁波出版社,1996年,第859页。

⑤ 永瑢、纪昀等编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九《凤池吟稿》“提要”,第1465页。

⑥ 永瑢、纪昀等编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九《梁园寓稿》“提要”,第1477页。

向炉边醉,又倚栏干听卖花。”认为“置诸《雁门集》中,正复难辨。”^①如果不是熟读《雁门集》,法式善不可能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。试举萨都刺《经历司暮春即事》和《闽城岁暮》二诗为证。前者云:“双飞海燕拂帘过,风卷鱼鳞剪绿波。闲倚石栏数春事,满池红雨落花多。”^②后者云:“岭南春早不见雪,腊月街头听卖花。海国人家除夕近,满城微雨湿山茶。”^③其音节、体制、风韵完全相同。对于以萨都刺为代表的元诗清丽风格,无论法式善,还是《四库提要》,都持赞赏的态度。《四库提要》评价萨都刺《雁门集》说:“虞集作《傅若金诗序》,称进士萨天锡最长于情,流丽清婉。今读其集,信然。”^④元诗的清丽,来源于对晚唐诗歌风格的摹仿。按着儒家诗学观念,如果往典雅的一面发展,可以称许为清雅;如果往俗艳的一面发展,则可能会被讥评为绮靡或纤媚。对于后者,《四库提要》是作为不良“习气”予以否定的,但二者的界限极为模糊,很可能将“元人风致”也一并否定了。

法式善对“元人风致”的肯定,对萨都刺清丽风格的欣赏,反映了他对元诗审美特质的认识、对元诗独特价值的肯定,这在清代中叶诗坛并不多见。乾嘉时期,随着盛世的来临,诗坛为了润色鸿业,开始倡导以“雅正”为核心的诗歌批评标准。以张景星等的《元诗别裁集》、顾奎光《元诗选》为代表的元诗选本,受沈德潜“格调说”的影响,选出的都是接近唐音的元诗;以《四库提要》为代表的诗学批评权威话语,肯定的是和平温厚、平正通达的“盛世之音”,因而无法认同晚唐诗、南宋江湖诗以及师法晚唐的元诗;以翁方纲为代表的“学人之诗”,以“肌理”“质实”等作为诗歌好坏的取舍标准,只肯定虞集等学养深厚的元代诗人,同样无法重视元诗的个性。只有法式善眼中的元诗,是既不同于唐诗、也不同于宋诗的具有“元人风致”的诗,因而也最接近元诗的真面目。这正是法式善的元诗批评留给后人的独特贡献。

总之,法式善的诗学思想远绍康熙年间的王士禛,近师乾嘉之际的翁方纲与袁枚,既重视元诗文献的搜集与整理,也重视元诗本身的艺术特质,在元诗接受史和清代诗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遗憾的是,近代以后,随着宋诗运动的兴起、元史研究的兴盛,元诗的接受与研究,逐渐走向了宋诗化、学问化的道路,元诗的真面目也愈加模糊。因此,回顾和探讨法式善元诗接受的独特视角,或许能带给我们新的启示。

(罗鹭,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讲师)

【责任编辑:吴刚】

① 法式善:《梧门诗话合校》,张寅彭、强迪艺编校,第 274 页。

② 萨都刺:《雁门集》,第 380 页。

③ 萨都刺:《雁门集》,第 264 页。

④ 永瑢、纪昀等编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七《雁门集》“提要”,第 1446 页。